

20 世纪
诗学考据学之研究

——以岑仲勉、陈寅恪为中心



项念东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

20 世纪 诗学考据学之研究

——以岑仲勉、陈寅恪为中心

项念东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诗学考据学之研究:以岑仲勉、陈寅恪为中心 / 项念东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36-7904-0

I. ①2… II. ①项… III. ①岑仲勉(1886~1961)—诗学—研究
②陈寅恪(1890~1969)—诗学—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7568号



出版人:郑可
质量总监:张丹飞
责任编辑:钱江
装帧设计:许海波
责任印制:王琳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址: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西路398号 邮编:230601
网址:<http://www.ahep.com.cn>
营销电话:(0551)63683012,63683013
排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50×960 1/16
印张:20.5
字数:320千字
版次: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考据的诗学如何可能？

胡晓明

马一浮说，诗者有史有玄。这一句就讲清了什么是中国诗。我年轻时只知道“诗有玄”，诗有玄就是诗有韵味风神意趣。那时候成都赖高翔师教我们读中国诗，赖先生是林思敬的高弟，六朝选体一流作手，教诗从王士禛入，“门外野风开白莲”，何等风神、何等意味！赖先生当年那一声意味深长的叹息，以及晚风轻语竹林子中他那一幅微醺的神情，记忆中犹如昨日。我至今仍然固执地相信中国诗如庄子笔下的温伯雪子，目击而道成，脱略行迹，兴象玲珑，诗有别才，非关知也，诗有别趣，非关学也；尤其是少年人的唐诗，多非生命的补假，实乃性灵的直寻。

随着年岁渐长，少年人的唐诗，渐转而为中老年的宋调，很自然的，诗有史有玄的“史”，才渐渐清楚明白起来了。尤其是国史、家史、心灵史，知识人的历史，被压抑者、被剥夺者的历史，痛痒相关；诗骚史汉，屈陶李杜苏辛，诗史一体，国身通一，感荡心灵，岂止是少年情怀与神思绮梦。王国维、陈寅恪，带着他们的各自所“关”之“天意”及“江东旧义”，召唤一诗国的新域。追寻而往，兴象风神与哲思意趣之外，也懂得了诗有史，本末兼具，读文学的人才不轻浮，不欺瞒，不虚无，不苟且，不自弃。

生命当然要有“飞扬跋扈”，要有梦幻光影，要有跌宕自喜，然而也要有梦幻后的清醒与沉醉后的觉悟，因而醒与梦，酒神与日神、美与真、温伯雪子与孔孟程朱，唐诗与宋诗，实为生命之两轮。懂了“有史有玄”，方才是升堂入室，看中国诗之接天莲叶与映日荷花，从此便风物无限。

所以，学中国诗，第一要懂得此“诗”非彼“诗”，中国诗悠久而广大，称名小而义类远。盈天下皆诗也。现代新诗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太

把自己当“诗”，也把中国诗看“小”了。

写中国诗的书太多，不懂这个简单的道理，越写离中国诗越远。

项念东博士认了这个理，前几年首拈“诗学考据学”一名，由史入手，正其名、立其义，疏理其渊源，夯实其基石，孜孜矻矻，著成一书，忽将付梓面世，余欣然序之：中国诗学，君可谓得其大者。

再进而言之，诗有史，史即事，事有时、地、人，即决定了解诗之法，务须考据。浅言之，要知作诗之时与写诗之人，材料之搜集，即是最初之证据与考释。何况，材料与材料之间，线索与线索之间，如乱麻如谜团，抽丝剖茧，剥蕉至心，皆是考据。考据之法究竟如何？有何类型、风格？有何发展、变化？传统至今，早已成一大学问；如陈寅恪、岑仲勉等，早已成一大宗师。后人追随，亦已各自成派。因此，以树立典范的方式，以对比之法，两两映衬，展现大师巨子之成绩、道路与精神，并与两大范式，开展深度对话，此种写法，比概论式之学理构架，更充实、厚重，更有益，也更有可读性。

项著认为，岑仲勉诗学文献考据之突出创获，乃在于极充分运用文献学、史料学于诗学之中，将此二种学问，于诗学中大放异彩。其平生所遗一千余万字的考据文字，既为唐史学之宝藏，亦为唐诗学之新题，开无数法门。

然而作者更认为，陈寅恪不同于岑氏之文献考证，实为一种历史考证。陈之特点，既为一流之史家，乃更深具有基于扎实史料考据之诗性灵光。寅恪诗歌考据之学，化真为美，回实向虚，转史成妙；旨在祛疑，始于求真，终于证美。实为诗学界不可多得之珍贵学术遗产。

作者区分了两类诗学考据。一为广义的诗学考据学，代表为岑仲勉先生。一为狭义的或核心的诗学考据学，代表为陈寅恪先生。从此，开后人两条大道，光景无限，学者可就其性之所近，择其路而行之。作者对于两大诗学考据范式的发现，是一大贡献。

然而作者对陈寅恪考据诗学要义的揭示，更是一大进境，一言以蔽之，陈寅恪诗学，可谓“考据即诗”。

概而言之，史学界看重考据学，然诗学领域，考据一名，毁誉参半。依据其中对考据的重视程度，意见略可分为以下六种：

害诗论。以考据为妨害诗意，煞风景。钱锺书讥讽陈寅恪解白乐天《长恨歌》，从杨玉环入官是否处女谈起，是一典型。

非诗论。以为考据与批评，各有领域，也各有性之所近，不可沟通，亦不必沟通。

反诗论。以考据为解构诗美之方法与途径。如宇文所安、田晓菲教授考证陶诗抄本异文，最终颠覆陶渊明传统形象。考据有功，然旨在破而不在立。

助诗论。以考据为手段，只是辅助，只是诗意理解之前提，最终为欣赏服务，可以得鱼而忘筌。陆侃如、程千帆诸先生皆此。

关诗论。以为有可考，有不可考。部分考据可增加诗意，部分考据却是减损诗意的。

代诗论。以为唯有考据，诗学方是科学。

项念东与上述部分肯定或反面肯定、有限肯定的考据论述，皆有不同。他的观点，尤有创见者，可明确概括为“考据即诗”，或“即诗论”。换言之，不仅如大家比较公认的，考据与批评鉴赏相融合，可以使批评避免空洞，考据避免繁琐，而且，考据本身，即是诗意本身。考据的过程，即想象、情感、记忆与美感经验的过程，即考据即诗意。这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更是一个实战问题，应以成功典型解诗案例，来加以证明。作者在书中已经举示了不少陈寅恪的考据佳例，来证明其突破性的论述。篇幅所限，此仅补充一例，以助成此说。

柳如是《西湖八绝句》是当时广为传诵的名篇，得当时诗坛大佬如程孟阳等佳评。钱谦益更是以诗为赞：“近日西湖夸柳隐，桃花得气美人中。”“杨柳长条人绰约，桃花得气句玲珑。”（见《有学集》）《西湖八绝句》其一云：

垂杨小苑绣帘东，莺阁残枝蝶乘风。最是西陵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

读此诗，即使从辞语考释中，知道了西陵寒食路，与苏小小《歌词》“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以及冯延巳《蝶恋花》“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相关，也不能懂得此诗旨趣何在。

陈寅恪的考证路线是：时、地、人。这首小诗写于崇祯十二年，柳如

是二十二岁，与钱谦益晤，同游西湖。然而这首诗的真正人物却是陈子龙。真正故事背景，是陈子龙、柳如是的心灵秘史。解读此诗的关键线索，即在二人情诗的相关辞语中。

证据之一：陈子龙《寒食》七绝（崇祯八年春）：“今年春早试罗衣，二月未尽桃花飞。应有江南寒食路，美人芳草一行归。”“垂杨小苑倚花开，铃阁沉沉人未来。”——这是陈柳相思。

证据之二：陈子龙《春思》（崇祯八年春）：“桃李飞花溪水流，垂帘日日避春愁。不知幽恨因何事，无奈东风满画楼。”以及陈子龙《桃园忆故人·南楼雨暮》。——这亦是陈柳相恋。

证据之三：陈子龙《春日早起》（崇祯八年春）：“独起凭栏对晓风，满溪春水小桥东。始知昨夜红楼梦，身在桃花万树中。”柳如是《五更》（崇祯八年春）：“醒时恼见小红楼，朦胧更怕青青岸。”——亦是陈柳热恋。

证据四：陈子龙《暮山溪·寒食》（崇祯九年春）：“……桃花透。梨花瘦。遍试纤纤手。去年此日，小苑重回首。晕薄酒阑时，掷春心，暗垂红袖。韶光一样，好梦已天涯。斜阳候。黄昏又。人落东风后。”——这是陈柳相分。八年春，陈柳同居于松江南园；同年夏，陈的正妻张孺人等，亲往南园，迫使二人仳离。

陈寅恪用情史当事人前后关锁的诗词关键，丝丝入扣地重建了心灵史现场，即陈子龙与柳如是于崇祯六年至九年，由热恋到分手的心路。

于是，《西湖八绝句》中“最是西陵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就好理解了。桃花得气，班固《答宾戏》：“得气者蕃滋，失时者零落。”孟棻《本事诗·博陵崔护》条，即“人面桃花相映红”。

柳如是不愧为陈寅恪所称道的“奇女子”。她不能忘其刻骨铭心之所爱，西湖春色重新唤起崇祯八年南楼的记忆；然而仅此不足为奇女子，她还要奋力摆脱与陈子龙分手后相思的痛苦，尽管只是暂时的摆脱。她用班固的典语，将唐诗里的人面桃花典改写了。诗中最美是人的形象，一反人面桃花传统中“明年春更好，知与谁同”的俗调，写出女性自主、生命自由的光彩。

由此可见，陈寅恪先生的考证，即考证即诗意。考据不只是手段、前提，而且即是诗意本身，不是得鱼的筌，而即是鱼本身。

陈寅恪的考据之所以本身即诗，不止是有情史的心灵故事，不止是有想象、记忆等诗之因素，更是对弱者尤其是女性的命运的关心，融情感于考据之中，与对象同心相应，所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今古同流”，是有生命的诗学，是不朽的诗学。

马一浮初曾致力于训诂考据之学；继而始悟其非，以为即使训诂精确，于自己身心及民风政教了无干涉（马镜泉《回忆伯父》）。夏承焘曾深悔辞章之学破碎大道，不能有益于身心（《天风阁学词日记》）。而陈寅恪借力打力，以考据救考据，活转中国诗史之学的真义谛，化真为美，转识成智。陈寅恪以现代之力，运其力道，解其魔障，返古典之魅，实为传统中国真正之托命人。

因而念东这部书，不止为中国诗学之新进境，更是一大见证，表明了中国文化托命传统之绳绳相续。是为序。

2014年7月20日

序	考据的诗学如何可能 胡晓明 / 1
引论	“诗学考据学”：一个值得关注的诗学问题 / 1
	一、问题缘起 / 1
	二、“诗学考据”：一个由来已久的特殊学术类型 / 6
	三、20世纪诗学学术史反思的一条线索 / 11
	四、考据与诗美之探寻：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的 “诗学考据学” / 16
	五、本书思路 / 23
第一章	现代学术视野中的“考据之学” / 29
	一、所谓“考据学” / 30
	二、现代学者对清儒“考据之学”研究进路的厘分 / 37
	三、“考据之学”的内在困境与潜在分野 / 43
第二章	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批评及两种考据思路 / 51
	一、《隋唐史》集矢于陈寅恪 / 53
	二、“李德裕无党”说 / 61
	三、“辩诬”还是“历史解释”？ / 66
	四、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 / 71
	五、金毓黻对岑仲勉与陈寅恪治史风格的一点比较 / 73
	六、断代史编撰中的“通”与通史讲授的专题化 / 76
	七、“追讨史源”与“从史实中寻史识”：两种考据进路 的形成 / 84

- 第三章 《元和姓纂》校讎与岑仲勉的唐诗文献考据之路 / 94
- 一、岑仲勉《元和姓纂》校讎的两个阶段及前期工作着力点 / 95
 - 二、陈垣的学术提示及岑仲勉《元和姓纂》校讎的学术创获 / 102
- 第四章 作为一种范式的诗学文献考据：岑仲勉的唐诗学研究 / 110
- 一、岑仲勉文献考据十大类别 / 111
 - 二、读《全唐文》、《全唐诗》二札记：20世纪唐人总集校讎之典范 / 113
 - 三、从辨伪到整理方案的提出：“白集”考据七篇及其学术意义 / 126
 - 四、史料开拓与唐诗学研究史料结构之缔结 / 134
 - 五、文献考据中学术课题之开发 / 139
 - 六、文献考据的“典范”及其内在缺憾 / 147
- 第五章 陈寅恪文献考据的诗性视角：兼与岑仲勉之比较 / 149
- 一、《新乐府·七德舞》本事考辨与“第一义谛”说之提出 / 151
 - 二、《新乐府·昆明春》异文考辨中的“诗意”追寻 / 155
 - 三、“诗性”眼光的背后 / 158
- 第六章 “第一义谛”之探寻：陈寅恪诗学考据之基点 / 160
- 一、由时地考证解诂“诗义” / 161
 - 二、历史考据中的诗情诗心 / 170
 - 三、探寻“第一义谛”的解诗学意义 / 177
 - 四、补说钱锺书对“诗无达诂”之反拨：兼与陈寅恪比较 / 182

第七章	史文蛻嬗：陈寅恪“诗史互证”说及其内在发展 / 190
	一、“中古史之难”与“诗的好处” / 191
	二、“中国诗与外国诗不同之点” / 198
	三、“心史”考探的思想脉络 / 203
	四、解读心灵秘密的一把钥匙：“古典今典”说的艺术 穿透力 / 209
第八章	原初的提问、三种进路与两大范式——20世纪诗学 考据学的初步考察 / 218
	一、“诗学”何以要讲考据？ / 218
	二、诗学考据的三种进路：以“幽咽泉流冰下难”的 考证为例 / 239
	三、两种范式及其交互影响：新时期诗学考据举隅 / 247
结语	求真与求美之辨证 / 260
附录	一、岑仲勉早年史地研究与其文献考据思路之形成 / 264
	二、岑仲勉 1935—1936 年致陈垣函考略 / 280
参考文献	/ 298
后记	/ 315

引论 “诗学考据学”：一个值得关注的诗学问题

“诗学考据”并非一现成的学术专名。之所以将“考据”与“诗学”缀合成词，主要用以指称素来援引考据方法以研治中国古典诗歌这样一种学术类型，亦即古典文学研究中常常可见的考证诗人生平行历、勘校诗歌文本同异真伪，抑或征文考典笺释诗歌语词意涵之类。缀上一个“学”字，用意则在追问此一学术类型究竟在何种层面上真正有助于中国诗艺术特质的辨析与开显。应该说，“诗学考据”的存在由来已久，并非新问题，但讨论考据对于解读中国诗内在的艺术奥秘到底价值何在，或可称之为一个值得关注的“新”问题。

一、问题缘起

2008年，海外中国诗研究名家宇文所安教授在一篇谈及《剑桥中国文学史》编写的文章中提出：

三四十年来，文学研究领域存在着两个对立的团体：一边是历史主义研究和考证；另一边则是文学理论领域的新发展。经过过去三十年的变化，这两个团体以一种新方式走到一起来了，而这种新方式对以往的理论家和以往的历史主义考证派来说，都是相当奇特和出其不意的。新的问题被提出来，这些都是明显的历史性问题，但是却很少有历史学家问到过。^①

他所说的“新的问题”，即如果对原有一直被确认为可以构筑稳定的文学史叙事的文学文献作文本编集抑或异文比勘方面的历史性考察（亦即常说的考证或考据），便可发现那些所谓“可靠”的文本恰恰是具有“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今日常见《曹植集》世传版本中的名篇《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诗。此诗最早见之于宋人郭

^① 宇文所安：《史中有史——从编辑〈剑桥中国文学史〉谈起》（上），载《读书》，2008（5）。

茂倩所编《乐府诗集》，然与该书所录曹植其他诗作不同，这首诗在郭书之前几乎找不到存在的迹象；考察其流传，除明代偶有引用外，亦并未进入一般文学史视野，直到经王夫之特别提示，才逐渐引发此后清代诗评家的关注。不仅如此，就诗义理解而言，后人从“自悲友朋在难，无力援救”（朱乾《乐府正义》）的视角来解读，以为该诗系曹植因好友丁仪因祸被杀而无法施以援手所作，也是 18 世纪以后才出现的，且这一阐释“没有任何证据”。文章就此指出，既然现代学者无法证明这首诗确为曹植所作或确非曹植所作，也不能证明通行的阐释一定是正确的或一定是错误的，且文学史上此类例子还很多^①，那么我们就“必须学会接受不确定性”，“必须审视那些对我们熟悉的叙事构成挑战的证据，审视那些使我们熟悉的叙事变得复杂化的证据”。而这样做也就意味着，对文学史特定现象的理解就应该按照“历史主义”的思路，“尽可能地确定所有现象和事件在一个大叙事中的发生时间与地点”；^②从而还原文学史本来具有的复杂性与多元面相。亦即是说，考察（准确地说，即考证、考据）并揭示文本“流动性”背后被有意无意忽略、误读、修改、扭曲的部分，重新审视文学史整体的叙事结构将成为可能。

正是出于这种“历史主义”的研究思路，宇文所安对传统的中国文学史叙事之罅隙与偏颇的讨论已有丰富的成果。^③而他一再关注的中国古代的“手抄本文化”以及文学经典的“经典化”研究，更引发出诸多的文学史研究话题。

作为一次集中性的探讨，其学术伙伴田晓菲教授 2007 年译介到国内的专著《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下文简称“《尘几

① 另如《古诗十九首》的来源问题，唐人眼中的唐诗以及宋人对唐诗经典的塑造问题。其中很多例子是极其有趣的。

② 宇文所安：《史中之史——从编辑〈剑桥中国文学史〉谈起》（下），载《读书》，2008（6）。类似的观点，还可参见《东方早报》（2009 年 3 月 8 日）盛韵的访谈文章《宇文所安谈文学史的写法》。

③ 笔者所见较早的论文如《瓠落的文学史》（1998）、《过去的终结：民国初年对文学史的重写》（2001），已收入《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一书（田晓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007 年发表的《唐人眼中的杜甫：以〈唐诗类选〉为例》（卞东波译，见《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 1 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唐代的手抄本遗产：以文学为例》（卞东波、许晓颖译，见《古典文献研究》，第 15 辑，凤凰出版社，2012）等。较近的著作如《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胡秋蕾等译，三联书店，2012），以及他为自己和孙康宜教授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刘倩等译，三联书店，2013）所撰写的第四章“文化唐朝”等。

录》”)可为代表。该书通过对宋人有关陶集手写本整理编订的学术史考察指出,今人眼中的陶渊明,其实准确说来是历代陶集编订者抑或陶集手抄本所“构筑和塑造”的陶渊明。正是这些手抄本文化世界中的“读者”(主要是陶集的编订整理者),对某种“稳定而单纯”的陶渊明形象的创造性“塑造”,构成了后此讨论陶渊明以及陶渊明时代的文学史叙事框架。从这个角度出发,《尘几录》强调,追寻陶渊明形象的“塑造史”,并不像文学接受研究所致力的那样,将不同时代的文学文本视为一种“稳定”的文本形式,以此来考察文学趣味、审美标准的演变;而是通过考证历来的“读者”对文本的参与性创造,以此观察手抄本文化世界是“如何变动不居”,以及如何构筑某种“稳定”的文学史叙事的——就像“宋人自己通过控制陶集文本异文而创造出来的”陶渊明诗文风格的“平淡”那样,从而对“异文选择”下的陶渊明形象有更为清晰、完整的认识。^①

很显然,这种通过对文学文献传抄衍变史的精细考证来透显一种文学史理论的做法,正是宇文所安所提出的、《尘几录》所实践的一种古典文学研究或曰文学考证的“新方式”。应该说,相对一直以来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献版本考察、异文汇校,抑或经由不断的考补订正来追寻某一典籍定本的努力,《尘几录》提出了一个素来学者可能不免有所忽略的“新”问题:既然文学文本具有很大的“流动性”抑或“不确定性”,而所谓“原本”(或“定本”)的追寻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可能也只是一种“想象”,那么依据这些文本所形成的文学史叙事如何尽可能“客观”、“真实”?缘此,宇文所安和《尘几录》所强调的,即充分利用文学文本版本流传演变中的异文考证,重建不同版本形态编纂、形成的特定“语境”,还原其在“创作—接受—批评”这一艺术生产历史流程中被附加、改造抑或遮蔽的诸种成分,揭示其某种“原初”面貌。在他们看来,这不仅有助于发掘固有文学史思考序列中各种不同的“沉积层”及其“断裂面”,亦可借此破除既有文学史叙事中的虚构成分。

从学术层面来看,《尘几录》通过考察四种早期陶渊明传记(《宋书》、《晋书》、《南史》中的陶传以及萧统《陶渊明传》)的“异文”、其与陶氏自传(《五柳先生传》)的关系,以及宋人对陶传、陶诗文本“异文”的选择,指出陶渊明以及陶渊明诗文之“平淡”与宋人陶集编订中的选择和“改造”有

^① 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引言”,1~22页,中华书局,2007。

着莫大关联,并进而试图发掘被这种“异文”选择“所压抑和隐藏着的‘另一个陶渊明’”^①。这些工作对了解陶集以及文学史或文化史中“陶渊明”的真相,毋庸置疑有着莫大助益。而这种文学研究“新方式”,对于反思传统文学史研究视角、拓展当下学术格局也显然具有强大的革新意义。而且,《尘几录》更明确提出:

考证是一个宽泛的词,它包括不止一种传统治学方法: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在现代社会,这些学科往往被视为保守、陈旧、枯燥、对当前的文化现实毫无意义,就连从事这些工作的学者都不免意识到这一点,常常感到有必要为自己的工作辩护。……考证可以为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带来一场革命,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运用它。简单说来,考证意味着运用我们手头拥有的证据,接受这些证据导致的结论——哪怕这结论是我们不喜欢的,或者是和上千年的传统智慧相违背的。^②

这段话为文学研究中考据方法的现实合理性所作的辩护,特别是其中所折现的现代科学理性,也是新时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所一再强调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早期陶传或许是“建立在诗人作品上”,或与陶氏自传有关,然陶渊明诗文的“平淡”却未必是“根据传记中的诗人形象被增删改动的”^③——至少陶渊明同时以及萧统编集之前的一段时期未必如此。

颜延之(384—456)与陶渊明(约365—427)基本同时,其《陶征士诔并序》即称陶潜“廉深简洁,贞夷粹温;和而能峻,博而不繁”(《文选》卷五十八);稍晚一些的沈约(441—513)也称其“少有高趣”,为人“真率”(《宋书·隐逸传》);萧统(501—531)编集其文亦序之曰“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陶渊明集序》)。如果说此三例对陶渊明其人的评价或与陶氏自传有关,那么陶集编定者萧统之前的颜、沈二人对陶诗偏向简洁、平淡、清真的认识,则很难说来自被“改造”的陶集。而且,两汉

① 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13页。关于四种陶传与《五柳先生传》之关联,以及宋人的“选择”,见该书第二章。

② 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205页。

③ 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56页。

魏晋以下,诗歌创作日趋五言之制,风格渐染“清丽”之风。^① 倘陶渊明其人其文非具率真、平淡之品格,非与其时文风不协,何以刘勰(约465—520)《文心雕龙·明诗》“铺观列代”、“撮举”前此诸多诗人之“同异”,独不见提陶渊明?何以钟嵘(约468—518)《诗品》虽称陶潜“咏贫之制”为“五言之警策者”(《诗品序》),却仍列之于“中品”?又何以昭明太子虽为陶潜編集,但在其以“事出于深思,义归乎翰藻”、“以能文为本”(《文选序》)为编选标准的一代选文大观之《文选》中,同样很少收录其诗文?

都此来看,与其说陶渊明人格及诗文中的“平淡”来自宋人之创造,莫若称之曰宋人之“再发现”或许更合适。因此,虽然《尘几录》的作者一再表明其目的“不是简单地颠覆对陶渊明的种种固有看法,而是希望给这些看法增加厚度和深度”,也强调要将陶渊明放到某种原初语境中来讨论,看其如何深深“植根于文学和文化传统”以及“对传统的革新”^②。但是,其祛魅般的文学史“知识考古”,在宣告一个新的陶渊明面相以及一段“真实”文学史叙事诞生的同时,似乎无形中也隐含有一些新的“迷魅”因素。而且,其后现代历史编纂学的研究视角中,现代求真理性对陶渊明形象的古典意义也不免带有几分“清洗”的意味。

当然,所谓“陶渊明形象的古典意义”这样的表述,可能不免某种价值判断的参与——而这一点,又往往与现代学术尤其是实证性研究对“事实”的充分理解、或曰“客观性”认识之间,存在一种难以克服的悖论。^③ 但是,在人类文明史的演进历程中,后代承继前代的文明遗产,实际乃是不断探寻并彰显一种“好的”(而并不一定是保持某种历史原貌的),抑或所谓“新的”、“进步的”价值凝结形式^④。因而,今天的学者为

① 如钟嵘《诗品序》曰:“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曰:“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

② 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18~19页。

③ 马克斯·韦伯即指出:“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见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38页,三联书店,2005。

④ 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强调指出的,“好与坏”的价值观念与“进步落后”的观念有关联,但前者应逻辑的先于后者,而现代以来的“历史主义观念”恰倒置了二者的关系,以“新”或“进步”为评判一切的价值标准。参见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今收入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9~10页,三联书店,2006。

此而作的对人类曾经一切历史文化记忆的“还原”和“重建”，并不应以是否接近全幅原貌为鹄的，而理应最终就其中“好的”价值成果尽可能作出某些提示甚至选择。当然，所谓“好的”价值形式和成果或许在不同时代、甚至不同的人那里有其特殊标准，因而任何有关“好的”价值的判断、提示、选择可能都不免某种僭越的嫌疑。但即便如此，不同文化传统乃至人类文化本身所固有的某些共通要素（这是一切“理解”的前提），以及现代学术已然展示出的“价值中立”原则背后的思想缺失^①，又提示适当背负一些“僭越”的批评或许是必须的。因此，“考证”固然“意味着运用我们手头拥有的证据，接受这些证据导致的结论”，但并不应以“和上千年的传统智慧相违背”为代价，否则这将会回到上世纪前半叶那种以“求真”的“结总账”为口号、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为旨归的“整理国故”者的途辙之上。^②

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宇文所安和田晓非两位教授的这项研究，对于当下古典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史研究课题的开拓堪谓极为有益的探索，但与此同时也不免再次提示如下问题：即现代以来考证型诗学研究是否一定只能以“求真”——即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为唯一标的，其着力处是否只在“真”的一域，而无法涉及中国古典诗歌之“美”的发掘（这恰恰是诗学研究不应也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质言之，“考证”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特别是古典诗歌研究，到底存在一种怎样的关联？抑或直白地说，中国诗研究到底还是需要考据，需要怎样的考据？

二、“诗学考据”：一个由来已久的特殊学术类型

应该说，讨论“考据”方法与“中国诗”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不仅直

① 马克斯·韦伯在批评现代文明发展中的偏弊时指出：“专门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肝肠，这种一切皆无情趣的现象，意味着文明已经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水平。”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黄晓晶译，176~177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② 参见罗志田《从治病到打鬼：整理国故运动的一条内在理路》，原载《中国学术》2001年第2期，后收入《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六章“从正名到打鬼：新派学人对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307~358页，三联书店，2003。